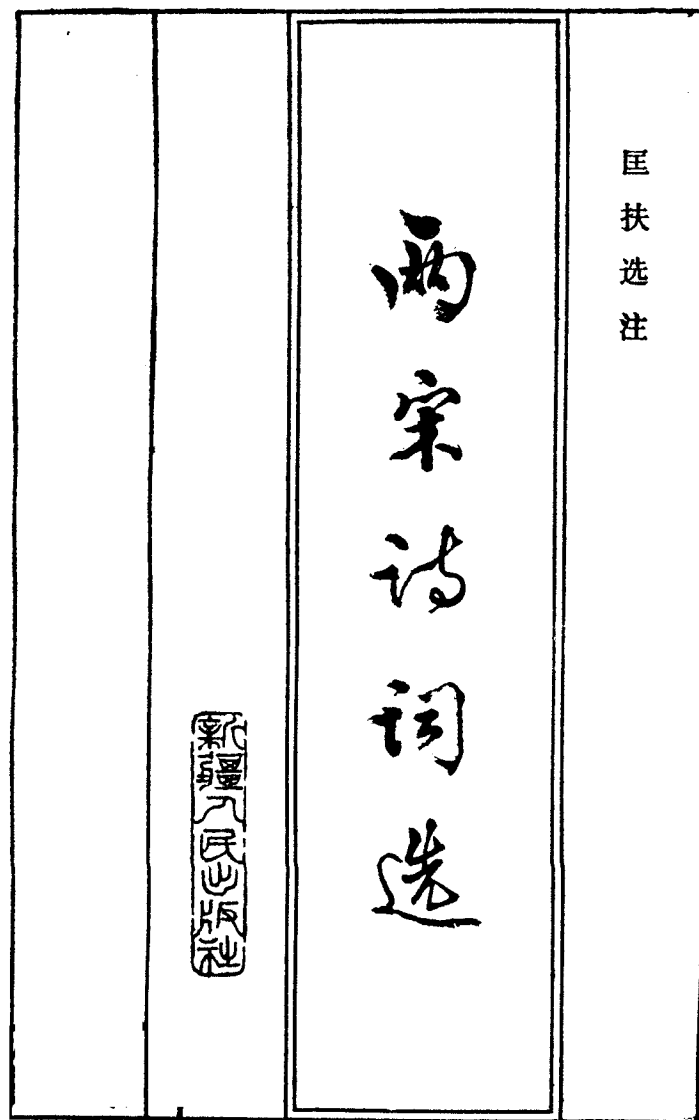


兩宋詩詞選

BH87113

I222.744
25
3



B 106406

两宋诗词选
匡扶选注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(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排版
新疆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125印张 2插页 180千字
1983年1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8·133 定价：0.95元

两宋诗词三题

一、两宋诗词的社会时代背景

唐帝国的末期，封建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，曾引起以黄巢为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，经过五年的斗争，起义军攻下了长安，但，由于内部的分化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，并没有建立成自己的政权，终于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而告失败。虽然如此，被起义军给以极大摧毁的唐帝国，再不能恢复原状了，而开始了封建军阀连年割据、混战的局面；外民族的统治者也乘机猖狂入侵。结果，在群雄角逐、互相兼并的形势下，分割成为十几个各自独立的小国家——历史上称之为五代十国的时代。

五代十国的连年混战，使人民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，痛苦不堪，渴望着统一局面的出现，尤其是中原地区，社会经济更蒙受着严重的破坏。这时，北周的禁军领袖“殿前都点检”赵匡胤，利用了这种有利的形势和人民厌乱的心理，凭藉着一部分军人的拥护，在公元九六〇年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“陈桥兵变”，回军开封，自己作了皇帝。当时的开封，是北方唯一的大城市，新兴的市民阶层也积极支持他。经过赵匡胤、匡义二朝大力的军事扫荡，结束了六十年来的战乱，建立并巩固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权，就是宋帝国。

宋初，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，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良措施，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解放，使北宋的农业生产，在五代十国残破的基础上，很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。由于中国封建经济规律的决定，随着农业的发展，手工业和商业也都呈现了繁荣景象。也就是说，赵宋建国后，经过真宗、仁宗二朝前后约一百年时间的休养生息，北方各省首先医补了战乱的创伤，社会经济渐次上升，南方各省，尤其是江淮两浙一带，以粟米盐茶及丝织品为主的工商业和海外贸易，均甚发展。与此同时，所有开矿、造船、纺织和造纸等重要工业，都在技术上、产量上有相当的提高。特别在印刷工业方面的发达，使北宋的印版书已基本上代替了手抄书，并且进一步发明了活字的印刷术，给文化的传播和推动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

赵宋从开国以来所采取的策略是：首先用主要力量谋求国内的统一，以巩固新王朝的统治；但对北方契丹族的威胁，却是“守”而不战，坐失积极防御的良机，遂使北宋始终处于契丹、女真二族不断入侵的严重威胁之下，并成为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屈辱、最衰弱的朝代。另一方面，伴随着社会经济恢复、发展的同时，由于官僚地主阶级对人民残酷的剥削，和为了厉行中央集权，给予了官僚地主阶级各种优厚的待遇，更加助长了冗兵、冗禄，以及皇室贵族生活的奢靡腐化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。逐步繁荣起来的工商业，也因赵宋实行专卖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垄断，受到极大的摧残。因而，北宋王朝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，正是阶级矛盾尖锐化、复杂化的过程，土地兼并，高利贷，苛杂的赋税和徭役，外民族统治者的入侵……不断冲击着北宋王朝的基础，

遂促成了神宗朝王安石的执政变法。新法的实施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，摆脱了财政困难，也增强了国防力量；但，不久新法即被封建官僚所歪曲，到徽宗时，甚至成为统治阶级压迫、剥削人民的招牌和手段，不仅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，反而加深了人民的痛苦。

十二世纪初叶，北宋王朝的政治腐败，已达于极点。徽宗宠任六贼^①，君臣荒淫无度，民不堪命。宣和二年（一一二〇），方腊在睦州以摩教^②组织人民起义。与此同时，在北方也有宋江等三十六人所领导的起义军，活动于淮阳、京东、河北、海州等地区。方腊起义时告民众说：

君臣们声色狗马营造祷祀甲兵花石等浪费以外，岁赂西（夏）北（辽）二虏银绢百万，这都是我们人民的膏血。二虏得赂，益轻中国，岁岁侵扰不止，朝廷忍辱纳币不敢废，宰相还说这是安边的上策。受苦的是我们百姓，一年到头劳动，妻子冻饿，求一顿饱饭不可得。这样的朝廷，你们能容忍么？^③

这正是道出了广大人民心中要说的话。但，北宋王朝一方面继续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，一方面竟对人民起义实行血腥的镇压。此时，东北新兴起的女真族，已逐步强大，灭辽侵入中原，北宋王朝仍然采取一贯的对外屈辱投降、对内镇压的失败政策，不能依靠人民武装进行抗战，致使女真族在一一二七年攻陷了汴京，北宋王朝遂被迫南迁。

南宋初年，虽也实行一些如免欠租、免牛税和开圩田等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，多少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，也增加了田赋的岁收；加以工商业、都市的畸形繁荣，对外贸易的兴盛，成为南宋王朝立国的基础，造成了小朝廷的偏安局

面。因而，南宋皇室和贵族生活的穷奢极欲，荒淫堕落，较之北宋末年并无异样，它们继续把全力放在对内镇压和无穷无尽的搜括掠夺上面，杀害、打击象岳飞、辛弃疾等爱国抗敌的志士，摧残全国抗战力量，把中原的失地和人民，久已置之度外。这样一个积弱而腐朽无能的政权，终于在一二七九年蒙古族统治者南侵之下，宣告了完全覆亡。

根据以上的叙述，可见两宋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而复杂的时代，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，当然是农民和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，其次是手工业、商人和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，中小地主和大官僚、大地主、大商人之间的矛盾；民族矛盾则是汉族和契丹、女真、西夏、蒙古等族之间的先后矛盾。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二者，有时还是扭结在一起的，构成了两宋社会错综复杂的面貌。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看来，两宋社会的上层建筑，两宋时代的文学艺术，都是这些矛盾直接或间接的反映。

这是我们论述两宋诗词的一个主要的先决问题。

二、宋诗的主要特点及其发展、演变

我们提到中国的诗，总喜欢说“唐诗”，所谓“唐诗晋字汉文章”，这意味着诗发展到唐已达登峰造极的境地。而两宋的诗，颇感后难为继，在文学批评史上一直遭到尊唐派的攻击，几乎体无完肤。宋以后的长时期中，宋诗是承担着极为难堪的冷落命运的。

首先出来贬低宋诗地位的人，是南宋的著名诗评家——《沧浪诗话》的著者严羽，他的主要论点是：

唐人诗与本朝诗，未论工拙，直是气象不同。

晚唐之下者，亦墮野狐、外道、鬼窟中。

他并未提出什么足够的根据，主观片面地把唐、宋诗看成是天上地下之别。向后的诗评家受到他很大的影响。继严羽攻击宋诗最力的，是明前后七子^④及其一派的人物们，如李梦阳在《潜虬山人记》中说：

诗有七难，格古、调逸、气舒、句浑、音圆、思冲、情以发之，七者备而后诗昌也，然非色弗神。宋人遗兹矣，故曰无诗。

这等议论，竟是对宋诗的一种完全抹杀的态度。和李齐名的何景明也曾说：

近诗以盛唐为尚，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。

卵翼前七子之说的李东阳，对宋诗也持有相同的看法，如他说：“宋人于诗无所得。”后七子的持论也大抵相同。此外，在明代还有一位向宋诗开火的健将杨慎，他说：

唐人诗主情，去《三百篇》近，宋人诗主理，去《三百篇》却远矣。匪惟作诗也，其解诗亦然。

明人泥涂宋诗的风气，直到清初还在泛滥，如吴乔曾说：

宋之最著者苏黄，全失唐人一唱三叹之致，况陆放翁辈乎？

可以看出，这些论者眼中只有唐诗的尺度，机械地拿来衡量宋诗，把宋诗所具有的时代精神和艺术特点，笼统地一脚踢开；有的人甚至有意在夸大宋诗的某些缺点，不仅说宋诗不及唐，而且也落后于元。这种对待宋诗的不科学、不公允的态度和看法，曾支配了诗评界相当长的时间。开始扭转这种倾向，把宋诗放在一定的地位上来重新认识的，是清人

吴之振和吕留良，他们同辑有《宋诗钞》一书，吴之振并在《序言》中说：

宋人之诗，变化于唐，而出其所自得，皮毛落尽，精神独存。

吴之振的这几句话，可谓能初步地从文艺传统的继承发展，和文艺的时代特征上来评价宋诗，使他们成为宋诗的功臣。终清之世，尤其是在清末，宋诗一直很受重视，也逐渐有人学步宋诗。但，在多数人的观点上，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掉尊唐抑宋的习气，诗人们不愿公开承认自己是在学步宋诗，假如你称谁的诗具有宋人气息的话，那么，就等于是对他的莫大污辱。

我们说，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，文学必然与其所产生的具体时代相适应，论述文学作品，自然要结合其相应的时代。唐、宋虽然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王朝，又前后毗连，但如就其社会经济、政治制度、民族关系和文化思想等方面来考察，则各有很大的差异，这就决定了唐、宋文学不同的面貌和成就，唐、宋的诗也不会例外。两宋的许多优秀诗人们，一方面不能不受到唐代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几位伟大诗人的启发；一方面也必然被现实生活所吸引，诸如农民的疾苦、政治的腐败和外民族的侵略等等。也就是说，中国诗歌中现实主义、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，在宋诗中同样呈现着无比的光辉；两宋伟大诗人如欧阳修、梅尧臣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陆游、范成大和文天祥等的出现，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。因而，宋诗中的精华部分，对我们来说，同样是极其宝贵和值得骄傲的文学遗产，需要很好地学习和探讨。

现在，试谈一下在两宋具体社会、时代决定下的宋诗的

某些主要特点：首先是宋诗的散文化。宋初诗坛上曾掀起过一次大的革新运动，斗争的矛头是指向了崇尚晚唐、五代排偶华丽风气的“西昆体”^⑤，这次诗的革新运动，是与当时的古文运动紧密配合着的。有名的诗人如欧阳修、梅尧臣和苏舜钦，以及稍后的王安石、苏轼等，同时也都是古文运动的健将。在“矫枉必须过正”的情势下，这些以诗家又兼古文家的代表作家们，就把散文的句法大量带到诗中来，形成了宋诗散文化的特点。它的结果，使晚唐、五代和宋初以来颓靡不振的诗风，一返于朴实自然、明白畅达的新境界。宋诗的散文化，从诗体发展演变的观点上看，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、革新的工作；而这一步工作，原是唐人所没有能、也不可能完成的工作。散文化的倾向，在宋人的五、七言古体诗中，当然是较为显著的，即使在近体诗中也经常可以看到。如梅尧臣的《杂诗绝句十七首》之一：

岸旁草树密，往往不知名。

其间有啼鸟，似与船相迎。

南宋的理学家、诗人朱熹的《次韵择之进贤道中漫成五首》之一：

日暮重冈上，人劳马亦饥。

不妨随野雀，容易宿寒枝。

在这二首五绝里所使用的散文句法，是宋以前诗篇中所极少见的。

其次，是宋诗的多议论。由于宋人喜欢在诗中发抒议论，讲谈道理，扩大了诗的题材，开拓了诗的境界，使五、七言诗更加冲破了个人身世感怀的局限，这正是受到了白居易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诗歌合为事而作”的好的影响。造成

宋诗此种风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简言之，如理学的昌盛，理学家经常通过诗来相互争辩；私人主持书院的讲学风尚和经策取士等等。尤其主要的原因，是两宋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的尖锐与复杂，政治家们对国是意见每多纷歧，而一些著名的诗人如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和陆游等，都直接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活动，就更助长了宋诗多议论的风气，为前此所仅见。我们后面所选的，如欧阳修的《食糟民》、王安石的《感事》；苏轼的《荔枝叹》等篇章，皆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作品。宋诗多议论的流弊，在于有某些少数诗人和理学家的哲理诗，类似偈语和格言，寡情乏味，以至淹没了文艺的特质，成为明人所攻击的“宋诗主理”的藉口，实际上他们乃是有意地夸大了这种缺点。

语言的通俗化也是宋诗的主要特点之一。中国的十世纪末以来，由于社会生活和人民语言的发展，促使了文人文学语言的发展，因而，在宋诗中又出现了语言通俗化的新气象。有许多诗篇写得明白如话，且不避人民生活中习见的事物。如苏轼诗：“但寻牛屎觅归路，家在牛栏西复西。”“今日江头风势恶，炮车云起雨欲作。”所谓“牛屎”、“牛栏”和“炮车云”，都是用人民口头上活的语言来写民间常见的事物。又如杨万里诗：“如何急滩水，又着打头风。”“暑懒归投簟，凉生打当书。”也是使用了本色当行的大众语言。宋诗中语言通俗化的特点，虽然是社会生活和人民语言发展的结果；但，诗人们肯于吸取、提炼民间口语，来丰富和翻新自己诗的语言，造成一种清新流畅、朴实自然的风格，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。严羽以后尊唐派的诗评家们，动辄诋之为浅露粗俗，正说明了他们是从封建正统文人的角

度上来对待这一问题的。

最后一个特点，是宋诗中写景小诗的发达与成功。宋诗中有许多优秀的描写自然景物的小诗，这些小诗写得都很客观，也很细腻，充满了画意。这可以说是五、七言诗进一步摆脱了古典派的束缚，面向自然的可喜现象。从中国美术史上来考察，两宋时期由于民间绘画艺术的发达，封建士大夫中亦颇重视绘画，反映在宋诗中遂多题画的小诗。同时，许多著名诗人如苏轼、范成大等，都曾长时间漫游过天下的名山大川，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体会也极深刻。这就给宋诗中写景小诗的发达和成功造成了有利的条件。写景的佳作，如王安石的《书湖阴先生壁》：

茅檐长扫静无苔，花木成畦手自栽。

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闥送青来。

又如徐玑的《行秋》：

戛戛秋蝉响似筝，听蝉闲傍柳边行。

小溪清水平如镜，一叶飞来细浪生。

宋诗中象以上的小诗极多，对客观景物的描写，绘色绘声，真切自然，基本上是一种写实的倾向。我们读到这些小诗，直如身临其境一样，会引起对祖国好山好水无限热爱的情感，值得研究宋诗者的注意。

我们提出宋诗这些主要的特点，也可以论证它的不同于唐诗之处，把宋诗的本来面目初步勾画一下，澄清过去诗评家们的某些不正确看法，重新恢复宋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应有的地位，相信这是目前古典文学研究中很重要的工作之一。

清全祖望在厉鹗所著《宋诗纪事》的序中说：

宋诗之始也，杨、刘诸公最著，所谓西昆体者也。

庆历（仁宗、一〇四一）以后，欧、苏、梅、王数公出，而宋诗一变。涪翁（黄庭坚）以崛奇之调，力追草堂（杜甫），所谓江西诗派^⑥者，而宋诗又一变。建炎（高宗、一一二七）以后，东夫（萧德藻）之瘦硬，诚斋（杨万里）之生涩，放翁（陆游）之轻圆，石湖（范成大）之精致^⑦，四壁俱开。乃永嘉徐、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，则四灵派^⑧也，而宋诗又一变。嘉定（宁宗、一二〇八）以降，《江湖小集》盛行^⑨，多四灵之徒也。及宋亡，而方、谢（方风、谢翱）之徒，相率为追苦之音，而宋诗又一变。

这段话对宋诗发展演变的几个阶段，划分得较为简明，向为论宋诗者所依据。试再具体一点来加以叙述，那就是：宋初诗坛近承晚唐、五代的馀绪，为了粉饰开国初期的表面繁荣，盛行着以馆阁文人为主要成员的“西昆体”，他们作品的共同特点是追求字面上的典丽工整，而脱略内容。与此同时，更有王禹偁、寇准、林逋、范仲淹和石介等诗人，他们或为白居易体，或规模晚唐体的真髓，竟以淡妆素服矫正“西昆体”的虚华浓艳，虽作用不大，旗帜还欠鲜明，却首先反对“西昆体”的风气，可视为宋诗的过渡时期。仁宗庆历初年，和政治革新运动同时掀起了在文学上反对“西昆体”的大运动，这个运动在诗人中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修、梅尧臣和苏舜钦等。他们面对现实，焦心国事，于诗力排缀花弄草、妆点太平的积习，以平易近人的语言，或讥刺政治的弊端，或揭露人民的疾苦，给宋诗注入了新的血液，受到了当时青年作者们的拥护，景然风从，取得了压倒“西昆体”的绝对优势，成功了宋诗的奠基工作。

经过庆历初年政治和文学革新运动的推动，在欧阳修等的培养、影响之下，接连产生了许多优秀诗人如王安石、苏轼和黄庭坚等，其中主诗坛的是苏轼，所谓苏门四学士、六君子^⑩，都是一时极负盛名的诗人。苏诗豪迈奔放，卓然自成一家，黄为“江西诗派”的倡导者，对宋以后的五、七言诗影响极大，他俩号称“苏黄”。严羽曾讥之为：“自出己意以为诗，而唐人之风变矣！”实际上这正是苏、黄的善于学习唐人，而又能加以创造和发展的反证。并由于苏、黄的出现，才真正显露出宋诗的独特面貌，与唐人划清了界限，把宋诗推向了黄金时代。

南北宋之交（一一二七年前后），由于女真族统治者的入侵，造成了国破家亡的残酷景象，宋诗坛从苏、黄的盛时忽趋冷寂，作家亦多踪迹“江西诗派”而无何进展，其中唯有陈与义、叶梦得二人稍足振作，堪称苏、黄的后劲。尤其陈诗所具有苍凉悲感的气息，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。南渡稍后，保持了小朝廷的偏安局面，陆续出现了尤袤、杨万里、范成大和陆游的南宋四大家。尤诗已佚，杨、范以清新著称，间杂有现实的烙印。陆游在南宋王朝政治腐化、外患频仍和民生疾苦的感受下，给予他的诗以雄厚的生命力，激发为许多雄奇奔放的爱国诗篇，为宋诗放一异彩。他们对宋诗的复兴作出了贡献。但，为时不久，宋诗即与南宋王朝的命运同时，由“四灵派”和“江湖派”之手而宣告结束。“江湖派”诗人中止刘克庄、戴复古二人差足称道。至于全氏所称的遗民诗人，方、谢而外，如文天祥、谢枋得、郑所南、汪元量等，均抱国破家亡之痛，发激越凄厉之音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，读之能激发我们爱国抗敌的意志，不愧为宋诗

的鲁殿灵光，我们必须加以重视。

以上就是宋诗发展演变的一个粗略的轮廓。

三、词的兴起、体制和宋词的主要流派

词就是诗，是诗的一体，而不是一种对立的文体。《三百篇》中的《南》、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，汉、魏的《乐府》，都是合乐而能歌唱的曲子。向后的五、七言诗既渐渐不能合乐而歌唱，遂演化为能合乐歌唱的词。词虽然在体制上与诗有别，实即长短句的诗。周贻白先生说：

一般人自以为曲子是从词体演变而来，却不知词体是诗的歌唱而形成，根本上原系曲子。其所以名为词者，不过是文体上一种术语。^①

周先生这段话说得非常对。实际上说，《三百篇》是两周的曲子，《乐府》是汉、魏的曲子，诗是唐的曲子，词便是两宋的曲子，到了元，索性回复了曲子的本名。因而，象过去文人们习惯于称词为乐府、诗余、长短句和新声等，都是不必要的。

我们知道，五、七言的新体诗，是唐人的新乐府。这种五、七言新体诗，字、句都很整齐，而音乐的曲拍则不一定如此整齐。用这种新体诗来合乐，音调中就不免有许多无字的虚声，词曲家称之为泛声、和声或散声，把这些虚声一一填成实字，连缀而为长短句，就成了词。朱熹曾说：

古乐府只是诗，中间却添许多泛声。后人怕失了那泛声，逐一声添个实字，遂成长短句，今曲子便是。

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其实词体的形成，并不完全由于词曲家的将泛声添上实字。更主要的因素，是唐的五、七言新体诗合乐渐合不来，民间唱起来很不习惯，已远远赶不上语

言和音乐的发展，就自创词曲一类的长短句的民歌，在合乐而歌唱，这可以说是从民间歌曲系统一直继承发展下来的东西。如《诗》、《骚》和《乐府》中皆有长短句，《乐府》中也原有泛声，就是很好的证明。词曲家的将泛声添上实字，不过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已。再从敦煌发现的《杂曲》、《俗曲》来看，更证实了长短句的词，同样是来自民间的新形式。

一般来说，晚唐、五代是词的幼年时代，到北宋开始繁荣起来。它的体制是先有小令，如《如梦令》、《三字令》等。其次有引，如《阳关引》、《千秋岁引》等。引又称近，如《祝英台近》、《诉衷情近》等。引、近更引长之则为慢词，慢与曼通，训为引、为长，如《卜算子慢》、《木兰花慢》等。此外，又有遍、破、序等，系从唐、宋的《大曲》、《法曲》中来的。或变为添字、减字、偷声和摊破等，表示于原腔调中字数有所增减的意思。《草堂诗余》首创词有小令、中调（引、近）和长调（慢）之分，后人多因之。毛先舒在《填词名解》中就曾这样说：

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，自五十九字始至九十字止为中调，九十一字以外者俱为长调。

这种说法曾遭到清人万树的驳斥，实则很难从其少一字或多一字竟作为小、中、长调的区别。词曲家把令、引、近、慢称为小、中、长调，只是概括来说的。词式的最短的是小令中的《十六字令》，仅有一十六个字；最长的是慢词中的《莺啼序》，它共有四叠，长达二百四十个字。

关于词的调名，来历各不相同，推究它们命名的本意，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：第一类是直用曲调名作词的调名，此

类较多，如《南歌子》、《浪淘沙》、《千秋乐》等。第二类是起于所咏的事物，如《双双燕》的咏燕，《暗香疏影》的咏梅，《女冠子》的述道情，和《临江仙》的言水仙等。第三类是取古诗中字句作为符号使用来作调名的，如《青玉案》，取张衡诗“何以报之青玉案”；《风入松》，取李白诗“风入松下清”等。第四类是以自己所作词中的某一字句作为调名的，如《一叶落》、《阳台梦》等，不过自别于他调而已。至词调名目的总数，清《钦定词谱》列八百二十六调，二千三百零六体；万树《词律》列六百六十调，一千一百八十体。后之论者虽各有所增减，但词的调名总不出八百到一千之间。

在晚唐、五代还处于幼年时代的词，为什么到了北宋就特别兴盛起来了呢？试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思想和艺术传统各方面来找寻它的原因。首先是工商业、都市的繁荣发展，给声乐伎艺的杂陈百出，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，词也是其中较重要的一种文艺形式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载：

凡京师酒店门前皆缚彩楼欢门，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，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，向晚灯烛荧煌，上下相照，浓妆妓女数百，聚于主廊楹面上，以待酒客呼唤，望之宛如神仙。

又说：

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，筵前歌唱。

可见当时不仅都市中娱乐场所的“瓦舍”^②里需要词，酒楼歌馆中也需要词，歌妓唱词已成为她们职业的重要内容之一。而文人们相沿而来与妓女往来的风习，也乐于替她们写词传唱，标榜风流，遂使词成为都市中具有社会性的需要